

鲍明炜语言学文集

顾黔 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鲍明炜语言学文集

顾黔 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鲍明炜语言学文集 / 顾黔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305-06834-8

I. ①鲍… II. ①顾… III. ①语言学-文集
IV. ①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6550 号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鲍明炜语言学文集
编 者 顾 黔
责任编辑 彭 涛 编辑热线 025-83686308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市溧水秦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31.25 字数 534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6834-8
定 价 65.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一

敬仰·缅怀

人类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说过：“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与平民学者鲍明炜先生同时的富者、贵者、既富且贵者，当以万千计。而鲍明炜先生在绵亘广阔的时空中，留下了他的道德，为其友人所称誉，为其学生所承继；鲍先生身后还传下了许多论著，必为后续学人所研读、所引用而泽惠学坛。这对于大半生坎坷困顿的鲍先生，此亦足以慰矣。

著名语言学家鲍明炜先生，1919年生于山东省鄄城县农家，于1942年考入迁至重庆的中央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解放后，中央大学易名为南京大学。可以说，鲍先生将自己的大半生贡献给南京大学，鲍先生的逝世，对南京大学的语言学科，以至对中国语言学界来说，实在都是重大的损失，每念及此，心情既悲哀，又越发沉重。

如今鲍明炜先生的亲属和学生，将鲍先生的遗著衰辑、整理，在组织的关怀下，将出版《鲍明炜语言学文集》。在付印之前，鲍师母令我作序，我的才、学、识不足以承担这个任务，自应由合适的同志撰写，必能得到好序。我只能写篇读后感，并且记叙一些史实，也许有助于今之人、后之人了解鲍先生的道德和文章。

鲍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这本文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古语云：“车有双轮，则有载用；鸟有两翼，堪任飞行。”我以为，这四句话对语言学也极为适用。试看当今的中国语言学界，一派闹热景象，堪称“人才济济”，但是如果仔细地考察，就会发现，只轮、单翼者过多。此话怎讲？在语言的研究中，平面描写和历史考溯本应并重，犹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缺其一则不可。不幸的是，近现代的西洋语言学史所显示的却非



如此,发轫于十八世纪末而大盛于十九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注重的是只轮、单翼,即历史溯源,以重建印欧原始母语为其终极目的。在十九世纪末勃兴的以索绪尔为鼻祖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则奉语言描写为第一要义,并进而成为显学,遂使历史比较语言学退居配角的地位,风光不再。这两百年的西洋语言学史,说明了一个道理:盛衰非定,没有永“显”的“显学”,犹如中国人的俗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反观十九世纪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则显然有别于西洋,如罗常培先生、王力先生都是横的描写和纵的贯通,即现代和古代兼治的语言学大家。现以罗常培先生为例,他著有《厦门音系》、《临川音系》等,同时又有《周秦古音研究述略》、《中国音韵学导论》等,这说明中国现代语言学的传统,至少是前期传统,是古与今兼通,中与洋并重(这有其历史渊源,限于篇幅,也为免走题,当于另文阐释)。鲍明炜先生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央大学求学时走上了语言学之路的,他始终坚持这一“双轮”、“两翼”的正确方向,直至垂暮之年,所以我们说,鲍先生既是汉语音韵学专家,又是汉语方言学专家,兼而具之。如果要评论鲍先生的学术成就,我认为,其高明处,首先在此。

请看本集,内收论文十二篇,专书一部。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音韵学的论著,重点是唐代诗文用韵的研究。鲍明炜先生的专著《唐代诗文韵部研究》,都33万字,穷尽式地分析、研究了初唐百年来的全部诗文的用韵。《李白诗的韵系》是与其师张世禄先生的《杜甫诗的韵系》并称双璧的名篇。鲍先生又乘胜复取中唐大诗人白居易、元稹的用韵加以研究,揣摩先生之意,他拟将全唐诗的用韵作一全面而彻底的研究,惜乎壮志未酬。鲍先生又以余力从事平水韵和现代诗韵的研究,写成两篇文章。这本文集的另一大部分是方言及方言史的研究。鲍先生是山东人,却对南京方言、江淮方言倾注了大半生的心血,结出了这么丰硕的果实,南京人、江淮地区的人应该深深感谢这位方言学家!请看这本集子里的诸多论文,鲍先生研究了江淮方言的源头,南京地区在六朝时本为吴方言,而后转变为江淮方言。鲍先生又根据文献资料和实地方言研究了近现代南京方言的衍变轨迹,实际调查了江淮方言与中原官话的分界,著文详加辨析。拙文前面曾说:“鲍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这本文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此非虚言,鲍先生还有两本大书,一是他主编的《江苏省志·方言志》,都112万字;另一是他和王均先生共同主持撰写的《南通方言研究》,84万字。这两本大书也是鲍先生对汉语方言学的重要贡献。如果这本文集的50余万字加上《江苏省志·方言志》、《南通方言研究》,则达200余万字。上文说鲍先生平面描写与历史推溯并重,



与罗常培等诸大家的精神完全一致，而高出今人甚多，这是他的学术特色之一。拙文在此接着点出鲍先生著作的另一特色，即“精邃”，这本文集篇篇都提出了闪光的论点。请读《略论汉语共通语的形成和发展》，一看题目，即知是大文章。那时鲍先生年龄不算大，但充满朝气，今日读之，此文犹凛凛然有生气。请注意，这是在《中国语文》1955年6月号上发表的（毋忘历史：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1952年《中国语文》方创刊），那时，新中国建立不久，广大民众，虽物质不丰，但精神状态却是意气风发，包括鲍先生在内的广大语言工作者也都以昂扬的气概，关心整个民族语言的大局问题，并着力研究。从《略论汉语共通语的形成和发展》这篇文章即可以想见解放初期鲍先生的政治热情、积极态度。那时，关于民族共同语的性质、基础方言和历史等问题尚在讨论中，意见并不一致。鲍先生主张“汉民族共通语早已形成”“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鲍先生建议“把已经存在的共通语加以分析，阐明它的特点和本质，推究它形成的过程，从而掌握他今后发展的方向，确立政策，制定计划，以促其加速发展”，这些话何等地铿锵有力，何等地高瞻远瞩！

鲍先生晚年还计划发起、主持一项巨大的工程。去世前他念念不忘的是《江苏方言丛书》的工作，已经获得省里支持，拟组织江苏各地的方言学家，编写出三十本省内各地方言的丛书。在已经获得省里的批准，即将付诸实践的时候，鲍先生不幸病重，住进医院，不及两月，赍志以歿。唐人那凄凉悲怆的诗句永远回荡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鲍先生对语言学的忠诚、热忱，对语言学的贡献将永远留在学人的心里。

我自1965年分配至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跟鲍先生同事多年，得其教益和帮助颇多。如今鲍先生辞世已半年余，我深切地缅怀鲍先生，回忆往事，倍增悲伤，爰述数则于下。

在旷世的“文革”里，“书读得越多越愚蠢”，因而所有的高校都“停课闹革命”。直到1972年才恢复办学，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管大学”。南京大学中文系本来有“语言专门化”的专业设置的，此时也恢复了，我记得有好些来自北京西山的矿工学员志愿学语言学，热气腾腾。当时系革命委员会还派过三位教师晋京上访国务院科教组（教育部、卫生部都没有了，职能被包含在这组里）申请办“语言专业”，也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找吕叔湘、丁声树、陈章太等先生开座谈会，找文改会叶籁士副主任请他们声援。鲍明炜先生当时被安排在系资料室只能做资料工作，但他对建立语言专业表示支持，因为鲍先生一手好字，申请报告还是他抄



写的呢。于此可见,虽身处逆境,鲍先生为人正直,事业心丝毫不衰。但是好景不长,某执政者,不仅反对成立语言专业,而且要把语言专门化撤销,竟有个别语言学教员也附和这个领导,但是遭到大多数语言教师和学员的抵制:“中国语言文学系不能只有一条腿啊!”这个负责人竟然通过资料室主任传话:“鲍明炜再跟这些家伙(指语言学的教师)说什么支持的话,就给他再戴上帽子!”

“文革”好不容易结束了,是1979年吧,可以搞校庆“五二〇”科学报告会了。我是刚升的讲师,我报告的题目是“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的问题,鲍先生见我紧张,就小声提醒我:“放松些,放松些,别紧张。”我讲完了以后,该是听众发表评论意见了,鲍先生给了我很好的评价,这对我是多大的鼓励啊!写这篇读后感的一个月前吧,我看《光明日报》,读到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的一篇散文,她回忆中学时代,写了一篇作文,得到了老师的赞扬,这对她日后的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是啊,当年老师的赞许就这么造就了一位未来的作家。

1984年,我那时住在学校的北阴阳营家属宿舍区。某日,大雨,我坐在北边的廊沿的小板凳上看书,眼睛疲劳时停下来休息,就痴痴地望着大雨,似乎飘烟起雾。忽见一人向一幢走来,裤管卷到了膝盖以上,那把被风刮歪了的伞怎能顶得住这暴雨?我很惊讶:“这么大的雨,是谁?”待人走近时,啊,原来是鲍先生!鲍先生那时是语言教研室副主任之一,他是来找我商量一件事,就是申请现代汉语硕士点的事。鲍先生倡议我们南大要申报语言硕士点,但是教研室有人对此无动于衷。在此必须倒叙一下此事的“渊源”:中国的大学一直不设学位制度,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后期吧,曾经模仿苏联搞了个“副博士研究生”制度,但是时间不长,随着中苏关系破裂,就取消了。直到1981年,国家决定实行学位制度,那时在江苏的语言学科,南京师院拿到了现代汉语、汉语史两个硕士点,徐州师院拿到了汉语史硕士点,而南大跟江苏师院、扬州师院一样,是零。南大连一个硕士点都得不到,多数语言学教师都感到沮丧。这时鲍先生挺身而出,带头争取硕士点,战略步骤的第一步是集合全体人马申报现代汉语硕士点。鲍先生是我尊敬的师辈,年过花甲,大雨滂沱之时特地从大钟亭步行到北阴阳营宿舍区,筹划此事,精神何等感人啊!我们大多数人就是在鲍先生的领导、组织下,硬是奋力拼搏,198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终于批准了南大的现代汉语硕士点,接着在1986年又得到汉语史硕士点,我们的语言学科才摆脱那很惨的困境。往后,我们学科在获取汉语史博士点和国家重点学科时,都得到鲍明炜先生的热情鼓励和支持,如今我们是



第二次获得国家重点学科了,但是绝不能忘记前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苦劳、功劳啊。我们学科的同志必须饮水思源,要永远记住鲍先生的丰功伟绩!鲍先生在耄耋之年领导编写《江苏省志·方言志》和《南通方言研究》,同时对我们语言学科仍然十分关心,经常热情地向我们提出各种建议。有鲍明炜先生,才能有我们学科的今天!

而今,不能再亲聆警教,不能再拜读新著,……写到这里,不禁凄然泪下。

鲁国尧

2008年3月13日于南秀村宿舍

序 二

深切怀念鲍明炜先生

鲍明炜先生不幸逝世,我感到分外悲痛。这不仅因为先生与我曾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期与六十年代初期先后受业于张福崇(世禄)夫子,先生以隔代同门高谊,对我多方提携与奖掖;更因为我在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汉语史硕士学位期间,先生正是我“音韵学”课程的授业恩师,我留校任教后又长年受到先生的面诲与教益。值此《鲍明炜语言学文集》即将刊印之际,鲍师母命我作序,我诚惶诚恐,自知无力完成这一重任,但又无法推辞,只能记叙南京大学语言学科受惠于先生以及先生对师长至为敬重、对学生至为关爱的二三片断,以作为对先生的深切怀念。

我是1978年秋入南京大学中文系进行研究生学习的。其时老一辈的著名语言学家方光焘、黄粹伯教授等已经作古;年近古稀者仅有我的导师洪自明(诚)夫子。在认真、紧张地指导我们这届研究生之余,自明夫子又受命承担教育部组织的全国高校训诂学讲习班的主讲重任,这使得他更加心力交瘁,在勉力完成主讲任务后,最终于1980年1月大病不治而辞世。因而在1981年国家决定实行学位制度时,作为长期以来我国语言学研究的重镇之一,又系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高校的南京大学的语言学科,竟然连一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也未获取。而江苏省内兄弟院校南京师范学院则获得现代汉语、汉语史两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徐州师范学院也获得汉语史硕士学位授权点。我们当时只是刚刚留校的年轻教师,尚不理解形势的严峻,而其时语言教研室负责人之一、年过花甲的鲍先生当仁不让,带领中年教学科研骨干鲁国尧、许惟贤、卞觉非诸位集体商议,统筹规划,决定先集中力量申报现代汉语硕士授权点,并于1984年获得成功,随后于1986年又获得汉语史硕士学位授权点。这两个硕士点的取得,为南京大学语言学的重新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先生无疑是继往开来的关



键人物。此后,语言学科又在鲁国尧教授带领下,于1991年获得汉语史博士学位授予权(后转为汉语言文字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并在2001年与2007年两次国家重点学科评审中顺利通过,以名列前茅的成绩重返国内语言学研究的前列。在这再攀高峰的过程中,鲍先生积极参与筹划,热情鼓励支持,并在耄耋之年仍有获奖科研成果以壮学科声色,确实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每念及此,我们都铭感先生的承启之功,珍惜我们学科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同时也要居安思危,争取更大的进步。

先生是1942年进入国立中央大学学习的,其时农家子弟考入中央大学殊为不易,先生由此扣开了修习与研究的学术之门。其后一段时间,先生有幸先后受到学术宗师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诸位的亲切教诲;语言学方面又有方光焘、张世禄、吕叔湘等诸位大师的悉心指导;再加上先生天资聪颖,奋发努力,因而很快秀拔于群。高年级时,中央大学率先在全国中文系设立语言专门化建制,先生即投张福崇夫子门下,潜心研究音韵学,并很快在学术界崭露头角。解放初期,先生往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随吕叔湘先生进修,同时又定期往北京大学从袁家骅教授治方言学,这使得先生在音韵学外,又精通方言学,从而奠定了先生的研究方向。先生的科研成果是多方面的,但这两门学问构成了先生学术研究的主体。受到这么多的一时硕彦的教导,每向我们这些后辈忆及,先生的敬重之情发自内心的而溢于言表。先生于胡、陈、汪三位十分景仰,言必尊称胡老、陈老、汪老,时时向我们赞颂三老的精湛学问;在中文系为三老编辑文集时,虽有其他众多年轻弟子各司其职,但先生仍然积极参与,多方协助,提供许多有益的意见与资料。先生于方、张、吕三位授业恩师同样十分敬崇,言必尊称方先生、张先生、吕先生,时时向我们说及受教益于三位大师的情景。在解放后的高校中教师之间长期互称“同志”、“老师”的情况下,“先生”这一称呼是对年高德劭者的敬称,兼可施于男性与女性,不像如今重又泛化为对一般男性的普遍性的客气称呼。方、张、吕三位大师解放后分别长期在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编辑文集的工作也分别由南京、上海、北京方面进行。先生与卞觉非、陆学海、方华三位主管了方先生文集与书稿的编辑出版工作;又主持了张先生文集在南京地区收集与整理资料的工作。说起张先生文章的收集整理,还有件值得一提的事。张先生论文极多,发表刊物的面又很广,不少在抗日战争期间写就的文章,在上海、北京都无法寻觅。但鲍先生却依稀记得,南京龙蟠里图书馆或许藏有这类杂志,于是我们去了那里,终于找到了所要的文章。那些杂志纸质极差,犹如涂抹了一层不均匀蜡光的黄草纸,加上年代久远,



页面既糙又脆,稍不留神就会碎裂。其时图书馆尚无复印设备,即便已有,这样的纸质也不堪承受复印;馆方又决不允许照相。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摆好杂志,工工整整地一字一句抄录。如此往返数次,才算完成任务。在为黄粹伯教授整理《唐代关中方言音系》书稿时,先生正卧病在床,但仍坚持反复梳理,一再润色,直至最终出版。先生常说,对师辈最好的敬重与纪念就是为他们的文集尽心尽力,这样才能泽被学林,流芳后世。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师辈整理出版文集,这在学术界已成惯例,但先生为这么多的老师花费了这么多的精力与时间,仍然给我们后辈以极大的启示。在为自明夫子整理文集的过程中,许惟贤教授带领我们那届研究生滕志贤、薛正兴、万业馨与我,做了一些应做的工作,因而有了《洪诚文集》等三部著作的出版,这使我们每每想起导师时,都能感到踏实与欣慰。

先生对学生们的关爱是人人尽知的。这种关爱并不止是生活上的嘘寒问暖,先生老年以后,更多的应是学生们对他的请安问候,这种关爱更多的是对学生的为人与业务成长的督促与鞭策。记得我还是年轻教师时,先生对我说得最多的是要我在既定的研究方向上深入下去,中年以后每取得些微进步,都会受到先生的鼓励,他还要我继续争取更大的成绩。先生还亲自举荐我去教育部参加某项重要工作,并再三嘱托要努力工作,为国家选拔人才,为学校争取荣誉,我坚持承担这一任务二十余年,至今未辍。先生对其他学生也是关怀备至,他亲自指导的高足,如钱咏平、薛遴、卜玉萍、顾黔、孙华先等人,目前正在各自岗位上担负着重任,并且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这固然与他们在校时受到南京大学中文系浓厚学术氛围的熏陶以及各位老师的教导有关,但更与他们读书时先生对他们的关爱培养,毕业后先生又对他们持续鼓励督促密不可分。有人甚至认为先生偏爱自己的学生,这其实是不了解实情而致的误会。先生出生农家,半生坎坷,是师辈的关心爱护让他增添了坚持的勇气。先生曾对我说过,解放初期,他家庭经济拮据,自己又罹肺疾,是福崇夫子解囊周济,才得以度过燃眉之急。先生要将师辈对自己的这种情分回报到对他们的敬重上,回报到对晚生后辈的关爱上。因而,先生并非仅是关心自己的弟子。记得先生在两届江苏省语言学会会长任上,每届年会的会余时间,先生的房间里都挤满前来问学与请益的年轻人。先生总是有问必答,百问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平时家居,也常有慕名求教的陌生人登门拜访,我偶尔也遇上过一两次,先生总是以礼相待,客人满意而归时,先生总要送出家门与之道别。由此可见,先生不仅对于自己的学生,对于其



他的所有求教者也都是关心爱护,尽力指导的。

如今先生已经驾鹤西去,我们再也无法亲聆教诲,唯有把我们的语言学科建设好,把先生敬师爱生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发扬开去,才是对先生的最好的怀念与最大的安慰。

柳士镇

2008年5月

目 录

序一	鲁国尧
序二	柳士镇
略论汉族共通语的形成和发展	1
《类音字汇》与盐城方言	8
六十年来南京方音向普通话靠拢情况的考察	15
苏北江淮话与北方话的分界	23
南京方言历史演变初探	38
六朝金陵吴语辨	53
江淮方言的特点	58
李白诗的韵系	67
论现代诗韵	82
白居易元稹诗的韵系	92
略说《诗韵》十三元	125
初唐诗文的韵系	133
唐代诗文韵部研究	169
语言学宗师方光焘先生	469
敬爱的恩师张世禄先生	473
汉语泰斗吕叔湘先生	478
附录 鲍明炜先生年表	482
编后记	485

略论汉族共通语的形成和发展^①

现在大家对汉民族共通语是否已经形成的问题,意见还不完全一致,有人说汉民族共通语早已形成了,有人说还正在形成之中。我们认为前一种见解是符合事实的。不管形成的程度怎样,汉族人民有个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总算是不成问题了。

这个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是什么呢?是北京话呢,还是普通话呢?大家看法不同,于是也发生了争论。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所谓南腔北调的普通话,不过是现代汉语在语音上向着北京话集中的必然的过渡现象而已,它同北京话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要是从发展上看,两者应该是一个东西。

从目前的争论中看,主张以北京话为标准语的基础的人已经占了压倒的优势。但这是从表面上看的,从实质上看,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占优势的主张并没有得出合理的结论,没有把北京话和普通话统一起来,只是在二者之中挑选一个,而另一个却被丢得远远的。

大家既然都承认有汉民族的共通语,那么,这种争论就没有必要。我们讨论问题就该从这共通语出发,而不应去争论哪一个是共通语。因为现代汉语和完全没有共通语的部族语言不同,部族语言的任何一种方言都可能发展成共通语,语言学家可以在社会还没有挑选以前,根据正确的理论预先代为挑选一种方言做为该部族将来的共通语基础(例如苏联北方各部族语言)。可是汉语就不同了,社会早已自然地形成了共通语的基础,并且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已经没有人为了的挑选余地。目前我们的任务不在于挑选而在于把这已经存在的共通语加以分析,阐明它的特点和本质,推究它形成的过程,从而掌握它今后发展的方向,确立政策、制定计划,以促其加速发展。

标准语问题实际上只是标准音问题

汉民族共通语的构成要素是怎样的呢?一句话,就是汉语传统的



文学语言加上北京音。许多人都根据斯大林所说“某些地方方言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可以成为民族语言的基础并发展为独立的民族语言”的理论,来证明北京话是汉民族共通语的基础。斯大林的理论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北京话”这个地方方言自然是可能做为民族共通语的基础的,但是北京话和其他方言的关系怎样呢?特别是和汉语传统的文学语言的关系怎样呢?这是我们应该进一步考虑的。

大家知道,汉语文学语言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建立起来了。两千多年以来,汉语史上“产生过许多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如散文家孟子、庄子、荀子、司马迁、韩愈等,诗人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关汉卿、王实甫等,小说家《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罗贯中、《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等。他们的著作是保存我国历代语言(严格地说,是汉语)的宝库,特别是白话小说,现在仍旧在人民群众中保持着深刻的影响”^②。在这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间绝没有什么突然地出现,从语言的观点上看,《红楼梦》是在《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的基础上产生的,《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又是在唐宋以来的讲唱文学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样可以一直推到遥远的古代。历史上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的伟大作品和它当代的口语都是紧密地联系着的,李白、杜甫的诗很多到现在还很接近口语,白居易的诗不是老太婆都能懂吗?柳永的词在当时是“有井水饮处,无不歌柳词”。至于唐宋以来的讲唱文学是讲唱者面对听众讲了又唱,唱了又讲的,更是和口语分不开了。现代汉语的文学语言显然是从古到今直线地发展下来的,在说它是在北京话的基础上发展成功的同时,如果忽视了这个历史继承,我认为是不妥当的。

比如,有人说汉民族共通语是在元代以后的以北京话(北方话的中心)为基础的白话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实汉语早在元代一千多年以前就建立起丰富的文学语言了,元代以后的白话文学作品并不是前所未有的。说汉民族共通语是在北京话的基础上发展成功的,好像说汉语在元代以前还没有文学语言,至少是还没有像元代以后那样的白话的文学语言。这是不对的,这只要看看唐宋两代的讲唱文学的盛况,就可以明白了。其实汉民族共通语在北京话的基础上发展以前,汉语的文学语言是有它的主导方言的,虽然这些主导方言曾经由一地点移到另一地点(比方长安洛阳开封)。如果说汉族一直到元代以后才以北京话为中心,逐渐地发展为民族共通语,显然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文学语言是在活的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活的语言的基础便是汉语的主流。



大家知道,汉民族共通语即使和它最近的前身(如《红楼梦》、《儒林外史》)相比,在词汇上也有显著的不同。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加添了大批的新词。这些新词是不是在北京话的基础上产生的呢?不是。远的不必说了,拿近的来说,像飞机、电车、学习、救护、物理、化学、思维、意识等大量的新词,能说是在北京话的基础上产生的吗?能说是在某一个方言的基础上产生的吗?即使在解放以后才产生或广泛流行的词,像无缝钢管厂、刃具厂、拖拉机、空调器等,也不是在北京话或某一个方言的基础上产生的。“无缝钢管厂”依北京话该叫“没缝钢管厂”,为什么不这样叫呢?因为这样不合乎早存在于文学语言的“无产阶级”、“无线电”等等的构词规律。近几十年来(以往也是这样)产生的绝大多数的新词,任何方言都无能为力,最有办法的还是我们的文学语言。但是,由于汉字读音迁就方音,我们的读音还不统一,因此,我们可以坚定不移地说:汉民族共通语就是传统的汉语文学语言加上北京音。

对这一点,近几十年来,关心汉语发展的中国语言学者是了解的。民国初年,胡以鲁和章太炎主张以湖北话做汉语标准语^③,胡以鲁只说在语音上应有所损益,没说在语法和词汇上也要有所损益。从前搞国音统一的时候,各方言区的代表(多是语言学者)曾在会议室里举手表决每个字的读音,也没有表决语法和词汇。可见他们都认为我们本有个对于各个方言都是共通的语法和词汇。毫无疑问,这共通的语法和词汇就是传统的汉语文学语言的语法和词汇。

在最近的讨论中,许多人都说所谓标准语并不就是北京话,是在北京话的基础上加上些共通的东西,再减去些特殊的东西。那么,这样一加一减之后所剩的是什么呢?恰好是传统的文学语言。不仅北京话是这样,其他任何方言经过这样一加一减之后所剩的也是这样。正因为汉语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历史最悠久的、强有力的文学语言,通过遍及全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通过深入民间的讲唱文学的讲唱者,对汉语各方言起了巨大的统治作用,它不允许任何方言向别的道路发展。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汉语的方言虽然很复杂,但就语法和词汇上看却是相当一致的。

当然,也不是说汉语的方言之间没有一些语法和词汇上的差异,只是这些差异是细微的。我们总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不管在哪一个方言区里,儿童一到高小毕业,顶多是进入初中,语法、词汇上的细微差异在他的日常说话中就少得多了,至于在严肃说话如演说时,这些细微的差异几乎不存在。这种情形对于北京话同样是适合的。这就充分说明汉语文学语言(书面语)对于诸方言有无比的影响力量。我们可以说现在诸方言间所



存在的不同只是语音。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标准语问题,实际上只是标准音问题。

汉语的文学语言

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总不出西安、北京、南京这个三角地区,汉语的主流就是在这个地区内发展起来的;其他各个方言都从属于这个主流,谁和这个主流的共同点多一些,谁就为全国大多数人所容易了解一些。大体上说,魏晋以前的文学语言是比较接近口语的,魏晋以后,一方面所谓正统的文学用语日渐脱离口语,作者承袭了不少已经僵固的古代的词和语。但是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们,如李白、杜甫、欧阳修、苏东坡等的作品还是比较接近口语的。另一方面,在人民大众的口语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新的文学语言,这就是所谓俗文学。民间的歌谣之外,从南北朝开始就有“变文”的流行^①,到唐代这种变文的讲唱就大大地兴盛起来,各地佛寺里都大规模地讲唱佛教故事和非佛教故事,听众们“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②。其盛况如此,其影响可以想见了。到宋代变文被禁绝,可是新的讲唱文学如鼓子词、诸宫调、宝卷等又出现了,其规模比从前更大,已不限于佛寺,进而深入农村了,陆放翁写当时的情景说:“斜阳古道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后来的弹词和鼓书到今天还盛行南北,在民间有极大的势力。无疑地,《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这些伟大作品都是在讲唱文学的基础上产生的。所有这些情形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在上述的汉语主流所在的地区内存在着一个大体上共同的普通话。很明显,像变文、鼓子词、诸宫调等广泛地在乡村和城市里流行,讲唱的语言不可能用地道的土话,因为他们要到各处讲唱,用地道的土话,听众不容易懂。这个普通话就是在各地的土语上经过文学加工的结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汉语共通语。传统的汉语文学语言就是在这个共通语的基础上产生的。

这种情形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来了解,就是读书音和白话音不同的现象。各地都有这种现象,例如:

北京话^③

例 字	宿	学	熟	摸	嚼	雀
读书音	su	eye	ʃu	mo	tɕye	tɕ'ye
白话音	ɕiou	ɕiau	ʃou	mau	tɕiau	tɕ'iau